

【書評】 Book Review

子安宣邦、崔文衡：  
《歴史の共有体としての東アジア》  
(東京：藤原書店，2007年)

張崑將\*

前言

《歴史の共有体としての東アジア》一書是由日本知名思想史家子安宣邦（1933-）及韓國世界史專長的學者崔文衡（1935-）所合著完成之書。本書扣緊其副標題：「日俄戰爭と日韓の歴史認識」，所以可說是以日俄戰爭作為主軸，並時刻呼籲從一個所謂屬於東亞的「歷史共有體」之行動理念出發。

本書共分兩部共十章，第一部作者是日本學者子安宣邦，第二部作者則大皆是韓國學者崔文衡，茲附上目錄如下：

- 序論 東アジア・歴史の共有に向けて  
——日韓關係を通じて考える.....子安宣邦
- I ナショナリズム・日韓關係・東アジア  
——自己表象と他者認識の病理
- 1 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解説.....子安宣邦
- 2 漢字論から見た東アジア.....子安宣邦

---

\*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

- 3 「韓」の痕跡と「日本」の成立  
——日韓關係の過去と現在.....子安宣邦
- 4 歴史の共有体としての東アジア  
——東アジア共同体をめぐって.....子安宣邦
- II 日韓・東アジア近代史の共有  
——「歴史」の一國化を超えて
- 5 百年前の東アジア、現在の東アジア  
——国際關係から見た日露戦争と韓国併合.....崔文衡
- 6 閔妃暗殺とは何か——日露戦争の序曲.....崔文衡
- 7 「閔妃問題」とは何か  
——角田房子『閔妃暗殺』.....子安宣邦
- 8 日露戦争と日本の独島（竹島）先取.....崔文衡
- 9 韓国「開國」の歴史——韓国歴史教科書の問題....崔文衡
- 10 自國の歴史を世界史の中で捉える.....崔文衡

從這個目錄可知，本書探討「東亞細亞的歷史課題」、「日俄戰爭與閔妃暗殺、獨島領土之歷史糾葛」以及強調「超越歷史的一國化之歷史共有體」等三個重點，而全書主軸係要凸顯一個「東亞的歷史共有體」的批判歷史方法論課題。以下依序簡評各章重點。

## 第一部各章評述

子安在本書的序言中說，他與韓國學者崔文衡的最初認識，是因藤原書店在二〇〇五年一月召開的紀念創立十五週年上，為崔文衡在日本出版的《日露戦争の世界史》一書所安排的一場演講會上相遇，並在閱讀其書後，促發日後子安注意韓國與日本關係的歷史，發表一連串有關「日韓關係」、「閔妃暗殺」與「獨島問題」的歷史批判論文，再加上崔氏既有的文稿，遂形成本書。子安高度稱讚崔氏本著優越的國際關係論之方法和徹底地精查國際關係資料的歷史認識和歷史敘述。子安仿如在異國找到知音，因為兩者都是批判「歷史的一國化」者。崔氏強調從世界史角度來解讀自己國家的命運，與子安追求以亞洲歷史認識的共有體，並用歷史批判性的方法，來不斷反覆、反芻自國與他國共有的歷史課題。

子安首先在〈序論〉中提及有關日俄戰爭的有名小說《坂の上の雲》，作者係著名的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1923-1996）。子安認為司馬氏主觀地將日俄戰爭（1905）定位為護持「祖國的防衛戰爭」，這樣的解讀如同靖國神社參拜的問題一樣，進而批評這些人或作家仿如是「時代錯誤的帝國之遺兒」。

子安貫以其歷史性批判之眼，重新檢視當代學者或現代學者對戰爭解釋的種種問題。子安指出：無論如何，戰爭都有其欺瞞性，但有些學者談日俄戰爭的歷史意義時，卻相當隨便；他們透過文字，主觀性地以欺瞞來言說，忽略從「被壓迫民族」的角度來檢視戰爭的合理性。子安認為，就日俄戰爭而言，至少牽動滿州的諸民族、朝鮮民族等「被壓迫民族」，但日本人在解釋日俄戰爭時，卻往往沒有韓國與中國觀點，甚至缺乏世界的觀點，留下的只有日本自己的觀點。子安由此批判司馬遼太郎將日俄戰爭視為「祖國防衛戰爭」，更想藉日俄戰爭的這種解釋，也合理化太平洋戰爭，把「史談」偽裝成「雜談」，以此想要免除其「言說責任」。（頁12-13）

子安舉出韓國學者崔文衡之觀點，認為從韓國觀點來看，日俄戰爭是和「閔妃暗殺」（1895）、「獨島佔領」（1905）息息相關，但日本人在討論日俄戰爭之際，是沒有「韓國」觀點的。實則崔氏作為世界史專家，看問題也絕不只從韓國觀點，他甚至把日俄戰爭看成是「亞細亞的世界大戰」（頁16）。

因此，子安要批判那些企圖把「歷史記憶一國化」的人，也就是只從一國中心主義解讀的歷史學者，往往不考慮對他國的傷害，故子安提倡「超越歷史的一國化之歷史共有體」，一貫以歷史性批判的方法，邁向他所謂的「東亞歷史的共有體」之理念，因而像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司馬遼太郎宣稱日俄戰爭是「祖國防衛戰爭」，以及角田房子（1914-）的小說《閔妃暗殺》等等，結局是將日本政府排除在戰爭責任或暗殺責任之外（頁20）。以上事例，都是傷害到他國人民，在本質上都是非道德的，因為在子安看來，所謂「道德」不會只是說「愛國」之事而忽視對他國傷害的事實。

因此，子安首先在第一章〈日本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解讀〉檢示「民族」之概念，發現「民族」概念的形成，是基於同一性的自覺和差異化的要求，這種自覺和要求同時也帶來文化的「日本民族」概念。但是，子安考察所謂「日本民族」或「大和民族」之稱呼，並不會是很久遠的歷史，根本也是近代的產物，而且日本「民族國家」的概念，還是以德國的民族概念為基礎（頁40-41）。子安一貫以其「知識考古學」立場，諷刺「民族」（nation）概念往往是「被作出來」的，所以子安從一個具有指標性意義的雜誌《日本人》（一八八八年創刊，一八九五年一度廢刊，一九〇七年改刊為《日本及日本人》，迄今仍存），檢示「民族」詞彙的出現，實則在昭和初年尚未出現，但在一九二九年忽然大量增加，故可以說日本「民族」之概念是在近代才被建構起來的，而當時正是滿州事變（1931）、中日戰爭（1937）到太平洋戰爭（1941）的十五年戰爭時期（頁28-31）。子安慣用考古學的解釋方式，把一些近代認為既定的實體概念，給予非實體、歷史性的言說來重新解讀。這樣的解讀作業之目的，不只是為解體而解體、為批判而批判，而是從既存的呪縛中解放而出，從而將此後的世界視為自己之事。

接著子安在第二章〈從漢字論看東亞〉，討論漢字的東亞歷史共有性之課題。事實上，子安在二〇〇三年時已有《漢字論：不可避的他者》（岩波書店），本章的立論大致與前書相同。此章延續第一章「日本民族」概念的問題，子安指出所謂「本土日本」即是「日本民族」概念的前身，是一批以日本固有古代為志向的國學者，設想在漢字或漢文化未傳入以前的純粹日本，本有她自己固有的言語，即「大和話語」（やまとことば）來看待世界萬物與現象。被稱為近世日本學問的集大成者的本居宣長（1730-1802），是德川中後期有名的國學者，就是這種熱衷日本的「固有性」者。

如所周知，八世紀日本最早的史書《古事記》和《日本書紀》是用漢字寫成的，本居宣長即把《古事記》文本，以日本古語「大和話語」來加以訓讀，成就了以註釋及評論的龐大巨著《古事記傳》四十四大卷，這是近代以前最偉大的成果，使之成為近代幾被神格化的作品。但子安不免疑惑宣長的訓讀法，畢竟宣長以新註釋學的言說完成的《古事記傳》，是否增加了什麼新東西？又遮掩了什麼舊東西？子安特別指出，宣長訓讀出日本的註釋學言

說，把《古事記》的「漢字神話」，以「大和話語」訓讀出來，如此神話真的成為「日本神話」。換言之，《古事記》透過了宣長的註釋學作業，成為日本的神典。（頁61-63）

毫無疑問，宣長的註釋學相當影響了近代日本知識份子，子安舉出明治維新以後致力於日本國語學者如山田孝雄（1873-1958），即視漢語為外來的侵入者。類似山田這類國語學者追求著一種「純粹國語」的概念，透過排斥漢語，以回復「本來的日本語」，藉語言的純粹性來強化日本人的認同意識（頁66-67）。子安舉出這類高唱「純粹固有語言」的國學者，無非想要證明所謂「純粹固有語言」，根本都屬近代的產物，是近代人物如本居宣長所創造出來的產物。子安特別指出「漢字」及「漢文化」對日本而言，甚至對東亞國家如韓國、越南而言，都是「不可避的巨大他者」之存在，甚至在傳統日本裡，「韓之痕跡」也相當明顯，只不過透過近代學者新的註釋之下，刻意抹滅這類有損「純粹」的「痕跡」（頁70）。

因此，子安繼續在第三章〈「韓」之痕跡與「日本」之成立〉一文中，探索日韓「歷史的共有體」。如果不了解日本古代史，大概很難想像即使日本現在許多舊地名皆有「韓的痕跡」。在日本古代史中，日韓也有過一段「共有體」的歷史經驗，甚至日本神話中也有不少有關「韓」的記載。子安首先提問「所謂痕跡是什麼？」說明「痕跡」就是完全過去、消去了的東西或事跡，即已經不可見其姿態的蹤跡。接著子安如是定義「韓」（から）的痕跡」，說它是一種被創作出來、生出來的東西，那東西即是「日本」，而在被生出的「日本」裡，「韓」現在只是存留「痕跡」而消逝，也就是說被消去的東西是「韓」，被創作出來的是「日本」。（頁92-93）

職是之故，子安踏尋日本古代史書《記》《紀》等古代文獻，發現有不少「韓」的痕跡。例如文獻中提到天照大神的弟神素戔鳴尊，與天照大神在天上世界的決鬥失敗後，成為被放逐之神而降於葦原中國、出雲，不久成為「根之堅州國」之主。本居宣長將「根之國」解釋為「黃泉之國」，但子安考察《日本書紀》一書卻是記載降於韓國古代國家「新羅」中，其他文獻中也都有類似「韓跡」的記載，可是江戶時代的學者如本居宣長的解釋卻努力

抹滅這個日韓共同體的「韓跡」。子安特別提到江戶時代一個相當有名的論戰，即一位考證學者藤貞幹（1732-1797）所著的《衝口發》，引起本居宣長特別寫《鉗狂人》以駁斥藤貞氏處處保留「韓跡」觀點的「狂人」。藤貞幹在《衝口發》中提到許多有關「韓跡」的論點，認為古代日本的制度、儀禮、祭祀、文字語言和衣服習俗等，基本上是經由被中國文化渲染的朝鮮半島，即依存於經由「韓」的「漢」文化而來的，又說：「辰韓，為秦之亡人，素戔鳴尊，辰韓之主也」、「歌乃韓之古俗，明也」、「本邦之言語，音訓皆由異邦移來也。和訓雖有種種之說，十之八九是上古韓音韓語，或西土之音所轉之也。」等等，都可證明「韓跡」確實在古代中日的歷史發展上有相當的密切關係。子安指出像藤貞幹這類觀點在本居宣長主張日本有自己的「固有起源」以前，可說是一般的見解。但這類論點卻被宣長斥為「狂人之言」而加以駁斥，從而重新注解日本古文獻的《古事記》，盡力把「韓」消去，而成立了「日本」。換言之，宣長透過消去「韓跡」，讀出了帶有固有國家性、文化性、言語性起源的「日本」。（頁97-103）

但是，弔詭的是，相較於江戶末期本居宣長要努力消除「韓跡」，子安又觀察到像昭和時代語言學者金澤庄三郎（1872-1967）所著的《日鮮同祖論》（一九二九年出版），卻又積極把「韓跡」找回來，而強調「日鮮同祖」論。如所周知，這時候的「日本」已是「帝國日本」，「韓跡」不過是依附在帝國日本之下才強調的「同祖」。（頁104-106）

子安的第四章〈作為歷史的共有體之東亞〉，是針對前三章作個小結論，特別凸顯「歷史的共有體」此一概念。首先子安回到現實爭議不斷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檢視戰後日本參拜靖國神社的首相，從吉田茂開始，到中曾根康弘，至最近的小泉純一郎，其頻率之高，顯現出不去參拜者反成為例外。子安指出首相帶頭參拜靖國神社，絕不會只是一國內部的問題或是一國主權的問題，而是攸關亞洲的歷史認識之問題。子安把參拜靖國神社之行為當成是「一國的國家主義」，也就是站在一國主義的立場將有關於亞細亞的戰爭記憶加以一國化，從而正當化日本在亞細亞戰爭的歷史和記憶，置傷害亞細亞人之心於不顧。（頁125）

子安更指出：所謂戰爭，不會是一國人的行為，而是涉及多國之間廣泛區域的加害與被害、支配與從屬、殺人與被殺之關係所進行的暴力事態，所以子安呼籲把這個深刻的歷史傷痕作為共有的記憶，以「共有」取代「一國」史觀，才能開啟東亞人民的共生未來之道，構成一個「歷史共有體」，從而喊出「東亞市民」的理念。（頁128-132）

我們如果深知子安所追求的「歷史共有體」理念，即可明白他積極地找到一些東亞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共有集體記憶，諸如「日俄戰爭」、「太平洋戰爭的琉球經驗」、「東亞」、「閔妃暗殺問題」、「靖國神社」、「漢字」、「儒教」等議題，努力挖掘這類曾經在東亞各國家的「一國化的歷史觀」下，如何被扭曲變形的歷史解釋，所以他的筆端永遠帶有歷史性的批判性格。

## 第二部文章評述

本書第二部的主要執筆人是韓國學者崔文衡，扣緊日俄戰爭所牽涉到的日韓歷史共有體的「閔妃暗殺」、「獨島佔領」問題而發，從而呼籲子安所提倡的「超越歷史的一國化史觀」，從一個「歷史的共有體」之理念來看待自國與他國之歷史爭議課題。

在第五章〈百年前的東亞、現在的東亞：從國際關係看日俄戰爭與韓國合併〉一文中，崔氏旨在提醒日本學界在討論日俄戰爭之際，往往忽略了韓國所扮演的角色。崔氏從有關列強關係與國際關係來看日俄戰爭，故他從百年前在東亞對立的清國、日本與俄國之間，來檢視韓國的命運，並追溯到百年前英俄對立及美俄對立之國際背景，將日俄戰爭的序曲看成是日本為美國打的「代行戰爭」，而日本所得到的回報就是韓國的保護權。崔氏特別指出，日本透過高明的外交，一方面甘為美國利用，一方面也利用美國，作者甚至認為小泉首相的出兵伊拉克援美，也是延續過去日俄戰爭前後的外交伎倆。

崔氏在此章最後中，感慨最近日本流行的「韓流」，以及韓國人最近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韓國人對日本的好感度達百分之四十三。因此，崔氏從這裡似乎看到日韓兩國未來進一步友好的希望，故也呼籲要實踐子安所宣稱的「東亞歷史的共有體」之理念，認為韓日要有「共同體」的前提，就是從「歷史的共有」開始，而對韓國而言，首先應從日俄戰爭開始，而日俄戰爭必須從「閔妃暗殺」與「獨島佔領」等這些重要的懸案談起。（頁150-157）

因此，崔氏在第六章〈所謂閔妃暗殺是什麼？——日俄戰爭的序曲〉一文中，探討閔妃暗殺何以與日俄關係有關。閔妃（1851-1895）在1895年甲午戰後被暗殺，根據日本小說家角田房子的作品，得出只是一位日本軍官個人的暗殺行為之結果，與日本官方無關。崔氏首先批判日本這些歪曲史實且具有影響力的小說如司馬遼太郎談日俄戰爭的作品《坂の上の雲》及角田房子的小說《閔妃暗殺：朝鮮王朝末期的國母》（1988年出版），他們實則阻礙了韓日的歷史共有體之建立。特別是後者的小說，幾乎是日本人唯一認識閔妃暗殺問題的讀本。因此，崔氏此章之目的即是想究明「閔妃暗殺」事件的「本質」。所謂的「本質」，即是在日俄對立的國際情勢之中引起的閔妃採行的「引俄拒日政策」，以及日本政府對此政策的反應，這是環繞在甲午戰爭以後朝鮮半島的國際關係之變化，故作者有必要從這個複雜的國際關係中探查閔妃暗殺的問題。（頁160-161）

關於閔妃殺害事件的主導者，有說是「大院君主謀說」，有謂「三浦首謀說」（三浦梧樓是當時派駐的日本公使），前者是因朝鮮王室不和而起，後者則是個人層次的事件。不過，崔氏認為此二說皆無道理，他從國際狀況的變化一一駁斥上述兩種說法，因大院君當時（1895）已是年高七十五歲的無力老人，且被軟禁於鄉野農村之家。又閔妃引俄拒清與拒日，所以清國與日本只是利用大院君以牽制閔妃，這才是閔妃與大院君糾葛的全貌。其次，日本想把此暗殺事件之大事，描繪成只是一位退休軍人三浦梧樓（1846-1926）之個人主謀行為，崔氏為此抽絲剝繭，發現一八九五年三浦到任日本公使的第三十七日後，即殺害了閔妃，事有蹊蹺，證明後面一定另有藏鏡人，即日本維新功臣井上馨（1836-1915，時任內相）所下的指導棋（頁164-173）。作者證明此事之用意，在於打破角田房子小說的「非日本官方說」之



結論，明確指出閔妃的暗殺實則出自日本內閣的政策，形成「不可見的日俄戰爭之序曲」。崔氏特別指出，為了兩國擁有「歷史的共有」之集體記憶，日本讀者必須正視閔妃暗殺的這段史實，而不是選擇無視或扭曲的解釋或態度。

崔氏有關閔妃暗殺的論文得到子安先生的注意，所以也寫了一篇〈所謂「閔妃問題」是什麼？——角田房子《閔妃暗殺》〉收錄在本書第七章。子安在這一章提及「閔妃暗殺」及「南京大屠殺」都是日本現在不敢直接面對的陰暗面。在本章中，子安特別針對日本一度暢銷的作品《閔妃暗殺》作批判性的評析。《閔》書是一部歷史小說，新潮文庫在二〇〇四年六月已經第十五刷了，可見其暢銷程度，作者是一位得過新潮學藝賞的角田房子。針對「閔妃殺害事件」，日本當局曾在廣島進行過軍法會議及審判，結果是將有關殺害的三浦梧樓公使及軍人、民間人士等，全部裁示無罪乃至免訴。換言之，日本政府對於「閔妃暗殺」問題一概撇清其責任歸屬，而角田房子的小說也呼應了這樣的事實。

子安首先追溯在日本記載下的《日俄戰爭》，發現韓國成為一個不存在的狀態。但是，眾所周知，日俄戰後日本正式成為韓國保護國，並在五年後併吞了韓國。子安特別擬了一個「日俄戰爭史年表」，第一個年表即記載：「1895年10月，日本殺害閔王妃（乙未事變）」，並在日俄海戰前夕記載：「1905年1月，日本政府閣議決定，編入獨島為日本領土。」（頁191）一般中國、日本的歷史記載，幾乎不會把「閔妃暗殺」及「獨島佔領」與日俄戰爭扯上關係，子安受到崔文衡作品的啟發，一度還拜訪崔文衡、親訪獨島，體會到「獨島問題」對韓國而言不只是「領土問題」，還包括難以忘懷的「歷史問題」，當然「閔妃暗殺」也是一個「萬劫難忘的恥辱」之歷史性、民族性的問題。但對日本而言，「竹島」（日本稱「獨島」為「竹島」）問題只是「領土問題」，「閔妃問題」在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幾乎也不見蹤影。（頁187-193）

子安何以把「閔妃暗殺」當成是日俄戰爭之始？無非希望讓日本對日俄戰爭之歷史認識上，能夠意識化到這個死角。（頁196）子安從審判三浦梧樓

公使無罪的結果看來，日本當時的政府想要一筆抹煞這個暗殺朝鮮國母事件的責任。但是，如同第六章提到的，經過韓國歷史學者崔文衡的抽絲剝繭，整個暗殺事件的幕後藏鏡人正是日本當局政府。如此，日韓兩國對於此問題的理解產生了斷層，韓國人以為此事件是屬於日本的「國家犯罪」，日本人卻將之完全隱入近代史的陰暗面去。子安從韓國人角度的觀點來重新審視角田房子歷來的歷史傳記作品，發現她所推崇的都是一些為國家意志而進行對鄰國人民殺戮的「國士」們，如涉及滿州建國的龜戶事件（1923）、朝鮮人虐殺事件（1923）的「甘粕大尉」（甘粕正彥），以及涉及「閔妃暗殺」的三浦梧樓公使等，都是如出一轍的風格作品，角田用的歷史觀點都是日本官方的解釋觀點，這樣簡單的解釋，不免有為日本當時軍政府脫罪的嫌疑。（頁206）

閔妃問題涉及韓日雙方「歷史共有體」斷層的問題，另一個「獨島佔領」問題亦然。第八章〈日俄戰爭和日本的獨島（竹島）佔領〉即旨在討論此課題。關於獨島問題，日本只透過一位漁夫中井養三郎的申請，以「無主地先佔」之理論，在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經過內閣會議，決議編入日本領土，不久也對日本鄰近的鬱陵島進行使用權的奪取工作。實則這兩項行動是為日俄戰爭備戰的戰略之一。崔氏從日後的日俄海戰過程中，獨島（竹島）與鬱陵島都是因應俄軍主力艦（Baltic艦隊）東航的日俄戰爭之決戰終點，戰後俄國第二太平洋艦隊司令官Rozhdestvensky中將即被捕於鬱陵島附近。其後，代其指揮的Nebogatov少將率其殘餘的主力艦向日本投降的地點正是距獨島東南方十八海哩之處。換言之，這兩個島嶼不只是海戰的終決地點，事實上也是「戰爭」的終決地點。崔氏認為這並非偶然，而是經過日本海軍縝密的作戰計畫之結果，因為鬱陵島與獨島是屬於同一作戰圈，為了戰略的前置作業，有必要將獨島收歸日本管理（頁212-213）。崔氏不厭其煩地考察日本官方的紀錄，為了就是證明獨島佔領決不是一位日本漁夫的申請作業而已，而是如同閔妃暗殺一樣，背後都有官方縝密的作業，亦即獨島（竹島）佔領是依據日本內閣為了進行戰爭的海軍戰略支援的一環。

以上諸章都是扣緊日俄戰爭相關的「閔妃暗殺」、「獨島佔領」而指出日本政府至今都不敢面對的陰暗面課題，崔氏作為一個世界史學者，也回到

韓國國內檢視自己國家的歷史教科書問題。在本書第九章〈韓國「開國」的歷史：韓國歷史教科書的問題〉裡，崔氏認為教科書的撰寫必考慮內容構成與執筆份量上的分配兩大因素，這攸關是否客觀、徹底地分析各事件在歷史上的重要程度，所以為配合其比重，必須考量執筆量的分配。但是，當崔氏檢視韓國百年前的「開國」歷史之教科書（金星社出版）時，發現韓國歷史教科書編撰者都無視此一原則。本章舉出以下十大缺失：

(1) 執筆量不只相當偏重「東學農民運動」，且其構成和目錄也被同一化，使此教科書給人「民眾抗爭史」之印象。

(2) 關於甲午戰爭（清日戰爭）和日俄戰爭幾乎全無記載。崔氏相當驚訝這兩個戰爭是攸關日本併吞韓國的侵略戰爭，而只以「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勝利，大韓帝國政府的改革遂被中斷」之一句話掩飾過去。

(3) 明成皇后殺害事件、日俄密商的密使事件，乃至刺殺伊藤博文的安重根義士等重大史實，亦皆簡單記載兩三行，非常不充分。

(4) 關於目前韓日間的獨島（竹島）領土問題之記載，也同樣粗略。

(5)、(6)、(7) 有關壬午軍亂及甲申事變的外交關係也皆說明不足。

(8)、(9) 攸關閔妃的韓俄密約（1884.12-1885.5）牽制清國的記載亦皆語焉不詳。

(10) 整體而言，這部歷史教科書只著重歷史的某一面向之重點記述，不能捕捉全體面貌。

以上崔氏舉出內容結構與安排的十大缺失後，又針對「事實的誤載」與「無視史實」兩項觀點繼續加以批判，多舉其專業的外交史觀點審視這部教科書對於近百年前的韓國外交關係幾近是無視。最後，崔氏指出金星社所出版的這本歷史教科書，只著重在強調「民族」和「民眾」，即如本章標題一樣，只強調「開國」的歷史，對其他喪權辱國或有損國格的歷史皆可忽視不

見，使得韓國近現代史有分崩離析的感覺，沒有照顧到歷史的全體面貌，從而也讓讀這本教科書的韓國青年學子，巧妙地助長了反美情緒及其憎惡心理。崔氏對於撰寫教科書者陶醉於感傷的民族性與民眾至上主義的情緒相當痛心；也對目前沒有的漢字教育，想要讓青年學子了解近百年以前的歷史更難上加難。在痛心之餘，崔氏提出以下三大解決問題：

一、歷史教科書應該統合一致，區分近現代史來教，實無其道裡。

二、撰寫教科書的執筆方針者，要明記教科書關係者的名字，這是相當重要的事情，因為歷史學家有負擔歷史記述的責任，絕不容認隱藏事實而無責任的發言者。

三、把在大學重要的學科區分為國史學科、西洋史學科、東洋史學科作為史學科，應有再度統合的必要，因為學問並不是孤立的存在。（頁238-251）

崔氏批判上述韓國目前的歷史教科書編寫之缺點，特別注意沒有好好介紹日俄戰爭，僅寫「日本在日俄戰爭勝利，大韓帝國政府之改革被中斷。」這與日本人主觀性地說日俄戰爭是「祖國防衛戰爭」一樣，是用「消去法」把歷史抹煞掉了，也讓年輕一輩者離歷史愈來愈遠。

以上崔氏對韓國歷史教科書問題的反省，在今日臺灣的歷史教科書之編寫問題，實也面臨崔氏的隱憂。在韓國，掩蓋歷史事實是為了「遮醜」，在臺灣新版的歷史教科書則是為了「去中國化」，兩者皆有讓近現代歷史分崩離析的情形，形成歷史學者基於不同的立場而各自表述的現象，十足反應歷史知識的移動性與主觀性。可見即使本國歷史學界對於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始終帶有「民族」之情緒，這似乎是歷史教科書編寫者的宿命，可見歷史教科書的課題，都牽涉到子安如何面對「歷史共同體」的課題，更呼應了子安提倡「超越一國化的歷史」的觀點是多麼彌足珍貴。

本書第十章，以崔氏〈在世界史中掌握自國的歷史〉一文的受訪稿作為終結。本章是崔氏接受《東亞日報》記者的訪問稿，內容多是陳述前面幾章

提過的問題與觀點，不過作為本書總結，崔氏提出「在宏觀視野下掌握自國的歷史」之理念，實則與子安所提的「歷史的共有體」之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韓日兩位歷史學者，都以歷史性的批判方法論，重新審視過往自國與他國存在的「歷史共有體」，汲取「共有體」中涉及的被掩飾或虛構的歷史。事實上，這是相當嚴肅的課題，身為歷史學者本應具有這樣的宏觀視野與批判方法，或者應該說這是成為一個歷史學者的基本前提。

## 結語

由上述各章之評述可知，本書用一個「歷史共有體」之理念，貫穿各章的日韓共有體之「閔妃暗殺」、「日俄戰爭」、「獨島佔領」、「靖國神社參拜」、「歷史教科書撰寫」等問題。子安這種具有歷史批判性的「歷史的共有體」之理念，誠然高貴，亦富正義，而且必然是批判性的。因此，用子安這種歷史批判性的觀點，常可以使刻意扭曲歷史者或忽視歷史者無所遁形，也常將冰封在歷史陳編中的歷史事件，經過這樣的方法重新解讀而獲得新生。由於子安這種方法論，是站在「超越一國化史觀」的至高點上，不斷地揭發出那些基於「國家神話」、「民族神話」所被遮隱的秘密，往往讓企圖遮掩歷史真相者或企圖建構歷史實體者現出原形。

只是，我們實在很難理解，子安提倡「歷史共有體」的歷史批判方法之理念，似乎在東亞國家的歷史學者中是個「異數」，甚至被日本學界當成「異類」。何以子安會成為如獨行俠一般，難以得到共鳴者？我們如果了解東亞國內在尋求一個「國內歷史的共有體」的共識時，其難度都已經相當高了，即可明白：如何再站在一個的更高點尋求「東亞歷史的共有體」呢？例如當日本國內還有不少「國家主義右派」的日本中心史觀者，子安這類高舉「東亞歷史的共有體」者，想要超越「一國化的歷史共有體」之理想反而是相當少數；再如另一作者崔文衡提到韓國國內的歷史教科書，致力於民眾或民族的「開國」歷史，對於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期喪權辱國的歷史不免以「遮醜」的手段掩蓋過去歷史，其結果反而遮蔽了那些具有不可抹滅的「共有體」歷史，結果不僅使自己國民輕易滑過這段歷史，也讓日本不正視這段

歷史有了充分而自然的藉口；再如臺灣的政治人物，對於國內共同深刻重要的集體記憶「二二八事件」，每逢選舉就努力消費「二二八事件」，各政黨擷取各自的需要作扭曲、過度或不敢面對歷史的真相，對於一個「共有體」的追求根本興趣缺缺。以上種種，無非證明子安所提倡的「超越一國化的歷史共有體」的理想之路，困難重重，這從如子安和崔文衡這類具有至高點視野或東亞、世界視野的人，通常是無法進入國家權力中心編制歷史教科書或充當編輯顧問即可窺知。我們再從反面觀察，子安這類批判史家之所以無法進入歷史教科書編制團隊，實因歷史教科書的編纂本就與當局的權力或意識型態緊密相關，他們當然是被當局排除在外的一群知識份子。因此，依照「歷史共有體」的理念，歷史教科書的撰寫必然是要脫離國家權力，並組成一個民間「超越一國史觀」的東亞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委員會，才能實現子安與崔文衡理念的第一步。

上述子安與崔文衡所提倡的「超越一國化史觀」的「東亞共有體」之方法論或理想，雖然碰到強大的「民族」與「國家」意識型態的限界（boundary）問題，但他們也絕不是孤獨客，世界局勢丕變，各國內部群眾也不是全然無知，在承認「一國」、「一族」的平等前提下，強調「自一他」的互相溝通與理解，也漸在東亞國家的知識份子中發酵。當我們了解子安的「歷史的共有體」之理想時，我們發現書中所列的重大「歷史共有體」之事件，不是只有「日俄戰爭」、「閔妃暗殺」等有關戰爭的事件而已，更有文化層次的「漢字」與「韓跡」等課題，這些都是重新解釋或研究歷史的重要寶藏。換言之，只要是東亞國家中彼此有「歷史的共有體」之事件或記憶，特別牽涉到戰爭與文化的解釋上，必須要站在雙方平等且正義的立場上，解消政治上的操弄，從文化多元的觀點，不斷地互相溝通，使雙方的「歷史共有體」之解釋，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對話互動性的知識再生產（而不是再複製）模式，達到超越「一國化史觀」的理想。

最後，我想以一個韓國友人的在日留學經歷，回應本書的「歷史共有體」此一深刻的課題，其實是不斷地發生在自國與他國民間交流的過程中。當我在閱讀子安宣邦與崔文衡這本共同著作時，常常想起我這位在日本認識的韓國友人。這位韓國友人在日本留學已經七八年了，曾向我提及他有一次

接受一位日本家長請他到他們居住的社區，教導當地社區及學生一些基本的韓國語言與文化，這是日本民間常舉辦的民間國際交流活動。這位韓國友人在幾天的交流中，都被接待寄宿在邀請他的日本家長中，當時日本新聞常播放北韓挾持日本人的「拉致事件」，日本家長的中學孩童聽到這則新聞，便有點鄙視地說討厭北韓。這句「討厭北韓」的話，實令這位韓國友人極其不自在，由於孩童要求多瞭解韓國的歷史與文化，於是他把日本對閔妃的暗殺、日俄戰爭及併吞韓國等傷害韓國的歷史全介紹給孩童，孩童不禁驚訝地一直提問為何這些日本侵韓歷史在日本歷史教科書中都沒有記載，而日本新聞卻在北韓的挾持人質事件中，大肆渲染與評論，幾近仇視韓國人。這則事例，實則反應日本歷史教科書的偏頗問題，我們無法期待歷史教育可以教導全面的歷史知識，但至少勇於面對歷史真相，遠比遮遮掩掩的方式，更能澄清與體現彼此共有的歷史經驗，這並無損於彼此的友誼，反而更能激勵友誼。從上述事例中，我們也發現具有政治意識型態的歷史學者想要用意識型態的歷史教育灌輸他們的「國民」應有的「國史觀」，也常會因民間交流的過程中出現破綻，可見民間文化交流的認識，比白紙黑字的歷史文字教育還更能體現子安所提倡的「歷史共有體」。什麼時候，東亞國家內部的政治力量干擾文化的認識愈少，則「歷史共有體」的理念便愈能彰顯。